

■ 文化传媒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再认识

穆琳洁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郑州 450000)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自提出以来便受到了全世界普遍关注,同时也对国内的跨文化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本文结合“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在解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新形势下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策略和途径,以期对我国的外语人才培养有所启示,进而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发展大局。

关键词:“一带一路”;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教育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7)03-0006-04

PDF 获取:<http://sxxqsfxj.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3.002

Reconsider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MU Lin-jie

(Zhengzhou Shuqing Medical College, Zhengzhou 450064,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aroused worldwide attention ever since it was proposed and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domestic cross-cultural talents. Based on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of cultivat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ith a view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as well as serv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trategies

一、引言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不断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由以往的面向西方为主逐渐转变为面向全球。中国要构建“一带一路”上的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民心沟通是成败的关键,而语言责无旁贷成为跨越文化藩篱,促进人文交

流,实现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这无疑对国内跨文化沟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同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主席又提出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通过积极主

收稿日期:2016-09-26;**修回日期:**2016-11-10

基金项目:2016年度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调研课题(SKL-2016-1380)

作者简介:穆琳洁,女,河南长葛人,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

动发展与相关国家的经济文化合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合作共赢的新格局。语言是人与人沟通、国与国合作的工具,无论经济往来还是文化交流,语言相通都是重中之重。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在德国柏林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师生代表座谈时就曾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地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处”。由于沿线50多个国家在历史传统、语言文字、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在对外交流过程中缺乏跨文化交际敏感性和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就可能严重影响“一带一路”建设有效展开和推进。要想在沿线各国消除文化隔阂,在增信释疑基础上加强合作意愿、完善合作方式,我们就必须要优先培养精通中外文化的“跨文化人才”^[1]。然而,我国目前的跨文化人才培养模式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培养过程往往以了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为主,而忽视了对中小发展中国家相关情况的学习。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必须明确当前外语人才培养的新任务,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培养真正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跨文化人才。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内涵

跨文化交际能力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国际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如何培养这种能力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论题^[2]。新形势下我们要想培养出真正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战略人才,首先必须要理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内涵。

就其定义而言,Perry和Southwell指出许多学者都曾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术语下过定义,虽然没有一个定义被普遍接受,但是学者们所下的定义和所作的理论概括都承认“跨文化能力是指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效恰当地交往的能力”^[3]。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是国内外学者展开激烈讨论的焦点。Spitzberg与Cupach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三要素理论影响颇为显著。三要素包

括动机、知识和技能,分别指代与别人交际的愿望,对交际的意识与理解,包含国家层面的各种文化变量以及个体认同,从事交际行为应具备的一些能力,包括留意能力、模糊容忍能力、自我平静能力、移情能力、自我行为调节能力和准确预测与解释对方行为能力^[4]。Byram结合外语教学的具体情境,构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模型,对外语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该模式由知识、技能、态度和性情、行为取向构成,这些要素与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及语篇能力共同构成了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系。在跨文化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部分已达成一定共识。Lustig和Koester认为,跨文化能力需要足够的知识、合适的动机以及训练有素的行动,单凭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获得跨文化能力。也就是说,知识、动机和行动三者结合才能构成跨文化能力^[5]。

纵观国内研究,贾玉新指出,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和关系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和交际方略能力系统^[6]。杨盈等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由全球意识、系统文化调适能力系统、知识能力系统和交际实践能力系统共同组成,它们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共同构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框架^[7]。全球意识是跨文化交际能力中最为基础的能力;文化调适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第二层;在全球意识和文化调适的基础上,对知识的掌握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第三个层次;而交际实践能力为最高层次。这个模型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四个层次,并描述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张卫东和杨莉从外语教育的视角出发,将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系分为文化意识、文化知识和交际实践三个维度,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证明了该理论框架的有效性^[8]。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包含的要素观点不一,但是从他们所列的要素中可以归纳出共同的部分,即认知、感情(态度)和行为这三个层面的能力面^[4],交际者不仅要掌握一般的语言和文化知识,还需要学习本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文、历史、宗教习俗等特定的文化知识,了解文化间的差异,树立全球意识。在感情层面,交际者要具备跨文化意识、还要在对自身本土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学会

尊重和包容他文化,并能够积极主动地与异文化成员进行交流;在行为层面,交际者需具有各种实践能力,如语言能力、非语言能力、灵活运用交际策略能力等。笔者正是基于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这三个维度来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策略问题。

四、新形势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的外语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不仅需要培养出精通沿线国家语言的高级外语专业人才,更需要许许多多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敏感性、掌握一定的语言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策略,能够满足带路沿线国家合作发展需求的跨文化沟通人才。作为以培养外语人才为己任的外语教育教学工作者,我们应该跳出固有的教育教学模式,以“一带一路”的需求为导向,从认知、感情和行为三个层面来重新审视并积极探索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问题。

(一)在学好英语语言技能的基础上让学生了解世界英语、世界文化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当前国内外语教育仅仅以学习标准英语或西方文化为目标远远不能满足国际合作和交流的需要。“一带一路”背景下,我们不可避免会与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接触,而这些异文化人所讲的英语势必也承载着这些国家的本土文化。本土文化和英语相融合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英语变体,如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等,对于不同的英语变体,我们应给予充分的包容和尊重,不能盲目地认为只有英美英语是标准的,其他英语都是不地道的。这种因语言而对人产生偏见的做法非常不利于我们的跨文化交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让学生了解到英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是包罗万象的世界文化,不是单纯的英美文化,而英语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与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沟通交流。

(二)开设带路沿线国家相关的小语种选修课,解其文化历史概况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众多,语种复杂,而

我国相关的语言人才储备却相较甚少。以英语、日语、俄语等大语种人才为主的传统外语培养模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与带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迫切需求。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说过,“假如你用一个人能理解的语言与他交谈可以传递至他的大脑,若用他的母语与他交谈,则可以传递至他的心灵”。要解决“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语言瓶颈,各个院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可根据自身地缘优势,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设相关小语种专业或选修课程。同时,课程的设置还要兼顾到语言相关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比如“东南亚文化”、“阿拉伯世界”等。学生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还能够深刻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从认知层面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学习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为跨文化交际奠定基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良好的语言水平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他在跨文化沟通中的人格形象,影响制约着他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进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深入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助于维护跨文化交际中个人的自信和尊严,还有利于发扬我国文化精髓,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在“一带一路”人才智库建设过程中,我们也要从文化交融入手,优先培养精通中外文化的“跨文化人才”,即在培养了解其他国家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外国通”的同时,也要协助有关国家培养更多的“中国通”^[1]。这就要求我们在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适时适量地增加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例如中国传统文化讲座、当代文化欣赏等,从而做到知己知彼,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增强文化差异的敏感度。

(四)合理运用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teaching),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使得我们与不同文化的碰撞日益增多,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更是迫在眉睫。高一虹在分析现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局限性的基础上就曾指出我国的外语教学实践需要以文化

意识的培养为中心,即注重情感和态度层面的批判性反思能力^[9]。然而,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化差异的描述和概括,而应该通过具体生动的案例分析,让学生学会以跨文化的视角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树立全球视野。例如,最近一家名为“上海雷尚”的化妆品公司在推广“俏比”洗衣液产品时拍摄了一部“把黑人洗白”的广告,该广告被指责为“史上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广告”,而公司给出的回应却是“没有想到这是种族歧视”,“外媒太敏感”等。透过这种鲜活的商务活动案例,学生不难发现背后的问题,即我们的一些企业太缺乏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意识,从而导致了对外宣传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用案例教学法让学生“悟道”比起枯燥无味的文化差异描述要生动得多,而分析案例的过程也是学生跨文化意识和批判性思维形成的过程。

(五)鼓励学生踊跃参加跨文化交流活动,提高学生的跨文化实践能力

国内著名跨文化研究学者胡文仲先生曾指出,与英语本族语者进行直接口语接触和交流,或者通过直接接触方式学习他们的文化,是提高跨文化能力的最佳途径之一(胡文仲,1999.)。大量的跨文化接触研究结果也表明,国外跨文化交流经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增强语言学习动机,减少语言使用焦虑,从而促进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因此,各个院校要敞开胸怀,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的“走出去”战略,根据所在地区的地缘优势以及带路沿线国家的需求,为学生搭建对外交流学习的平台,鼓励学生参加大学交换生项目、国际志愿者活动、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夏令营、国际冬令营或国外相关企业的实习或实训,使学生主动融入世界,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灵活运用所学的语言知识,深刻体会相关国家文化习俗,积累跨文化交际策略,从行为层面提升自身跨文化实践能力。

五、结束语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战略,顺应了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必然趋势,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各民族间的经济和人文交流更为密切,培养具备一定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成为各民族间民心相通能否实现的关键。新形势下我们要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转换思路,在深刻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的基础上,从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积极探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模式,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 周虹,“一带一路”需要跨人才支撑[N]. 人民日报, 2016-02-01.
- [2]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 [3] Perry L & Southwell L.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skills: Models and approaches[J]. Intercultural education,2011.
- [4]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J]. 外语界,2013(6).
- [5] Lustig M & Koester J.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7.
- [6]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 [7] 杨盈,庄恩平. 构建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J],2007(4).
- [8] 张卫东,杨莉. 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系的构建——基于外语教育视角和实证研究方法[J]. 外语界,2012(2).

[学术编辑 温宏社]

[责任编辑 熊伟]